

财政人的大型文学刊物

财政文学

CAIZHENGWENXUE

刊名题字：财政部部长谢旭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财政文学会主办

第3期

·卷首语·

继承弘扬财政优良传统作风 谢旭人

·特别推荐·

艺术辩证法的启示与灵感 李岚清
研经品典 启智取道 王军

·诗·词·赋·

念先贤 贾康
吟咏白城赞鹤乡 岳学鲲
繁星 吴守峰
风中的思念 周燕
无独有偶 张更华
我们行走在春风里 徐进

·散文·

童年旧事 李乃洁
感受伟人的细致与非凡 孙国府
挨饿的记忆 廖路明
状元、棋后及其他 詹静涛
三人行谁是我师 肖书胜
一个梨乡人的记忆 罗瑜平
怀念钢笔 苗福生
从滇缅公路走来 余知航
遐想不尽的大美 张国才
那片让人感动的热土 刘启生
腊梅 耿建青
一件运动衫 王世宏
四明山上盛开的奇葩 许燕歌
马良神笔绘春秋 田欣雨
瞬间阳光 宁新路

·报告文学·

债券 邱朝平
爱有多远 文猛

·小说·

买油记 赵磊
一道特别考题 唐汉平

2011.12

继承弘扬财政优良传统作风

谢旭人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财政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和继承弘扬财政优良传统，是新时期财政人的精神需要。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几个方面。

继承弘扬财政优良传统作风，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具体要求。几十年来，一代代财政人在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保障和推进党的各项事业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丰富而厚重的宝贵精神财富。继承弘扬财政优良传统作风，对于进一步推动财政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建设，推进为民、务实、清廉财政机关建设，更好地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继承和弘扬财政优良传统作风，是开创新形势下财政工作新局面的客观需要。财政工作迫切需要加强财政干部队伍建设，全面提高干部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牢固树立为国理财、为民服务的财政工作宗旨，强化财政优良传统作风，明确价值取向，提高精神境界，增强敬业精神，为“十二五”时期财政发展改革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继承弘扬财政优良传统作风，是加强财政机关干部作风建设的重要抓手。加强作风建设意义重大，继承弘扬财政优良传统作风，要求通过深入发掘、整理、弘扬鲜明体现财政机关、财政工作的优良传统作风，以过去一代代财政干部流传下来的好传统好作风，来克服那些消极的、不健康的风气，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和事业观。

要继承弘扬财政优良传统作风，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财政优良传统作风的内涵和精髓。财政系统的优良传统作风，是一代代财政工作者在一言一行、一时一事中，不断实践、积淀、升华形成的，是财政改革发展不断向前的动力源泉。今天的财政人应充分继承和发扬老一辈财政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添薪加柴”，进一步丰富财政优良传统，为财政优良传统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财政优良传统作风，体现在日积月累、甘于奉献的工作意识和职业操守上。财政工作联系面广、涉及领域众多，多年来，财政工作者兢兢业业，苦干实干，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踏实细致的作风来对待工作，潜下心来刻苦学习，沉下身子勤奋实践。“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做好新时期财政工作就必须甘守淡泊，默默奉献，积极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从细微之处入手，在日积月累中铸造新的伟业。

财政优良传统作风，体现在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工作方法和理念上。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也是财政优良传统作风的精髓所在。财政工作要求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党性原则，从国家利益出发，抛却私心杂念，敢于实事求是地反映真实情况，有喜报喜、有忧报忧，讲究科学，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这一优良传统必须坚定地传承下去。同时，艰苦奋斗作为一种精神品格，在财政工作中起着战胜困难、砥砺意志的重要作用，一代代财政人正是用艰苦奋斗的创业实践书写了财政事业的辉煌，正是靠着艰苦奋斗的思想自觉保持着奋发向上的工作状态。在新时期推动财政事业科学发展，更需要全体财政干部继续保持并发扬光大艰苦奋斗品格。

财政优良传统作风，体现在为国理财、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和不懈追求。财政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重要工具，“为国理财，为民服务”诠释了财政工作的目标，也是财政优良传统精神的基石。财政人必须始终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公私分明、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克己奉公，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财政发展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要以继承弘扬财政优良传统作风为切入点，不断推进机关干部队伍作风建设。财政优良传统作风是财政文化的精髓，我们要进一步完善财政文化建设的长效工作机制，进一步推进为民、务实、清廉财政机关建设，鼓舞和激励干部职工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奋勇前行，为财政事业科学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



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谢旭人

财政文学

CAIZHENGWENXUE

财政文学学会领导：
名誉会长：王 军
会长：胡静林

财政文学学会顾问：
项怀诚 王 蒙 贾平凹 周笃文 曲永兰

《财政文学》编委会成员：
王彦欣 王家新 何杰平 张国才 嵇 明
邹 平 岳学鲲鹏 苗福生 吕 萍 宁新路

主办：财政文学会
编辑：《财政文学》杂志社
总策划：张国才
主 编：宁新路

责任编辑：兆燕 亚梓 时雨

装帧设计：杨一光
电话：010—63803919 68553141
投稿电子信箱：czwxzz@163.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财政文学.第3期/宁新路主编.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141-1427-0

I. ①财… II. ①宁…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6517号

责任编辑：吕 萍 于 源 于海汛
技术编辑：邱 天

财政文学.第3期

主编 宁新路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 邮编：100142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87×1092 16开 12.625印张 300000字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册

ISBN 978-7-5141-1427-0 定价：30.00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MULU

目录

· 卷首语 ·

继承弘扬财政优良传统作风 谢旭人 1

· 特别推荐 ·

艺术辩证法的启示与灵感 李岚清 3

研经品典 启智取道 王军 17

· 诗·词·赋·

念先贤 贾康 55

吟咏白城赞鹤乡 岳学鲲鹏 56

繁星 吴守峰 57

风中的思念 周燕 58

无独有偶 张更华 59

迷人的虹桥 余雄 60

山乡变奏曲 谢和平 61

专员办礼赞 李冬云 62

灿烂传扬 邢艺 63

我们行走在春风里 徐进 64

· 散文 ·

童年旧事 李乃洁 65

感受伟人的细致与非凡 孙国府 71

挨饿的记忆 廖路明 78

状元、棋后及其他 詹静涛 81

三人行谁是我师 肖书胜 85

一个梨乡人的记忆 罗瑜平 91

怀念钢笔 苗福生 96

从滇缅公路走来 余知航 99

遐想不尽的大美 张国才 104

那片让人感动的热土 刘启生 110

街角的书摊主 王芳 112

腊梅 耿建青 115

一件运动衫 王世宏 118

四明山上盛开的奇葩 许燕歌 123

马良神笔绘春秋 田欣雨 126

我的家乡在林海雪原 魏国峰 129

弥河印象 陈志顺 130

白发 姜月娥 132

胖叔 赵明治 135

路 沈茂昀 139

春日里的约定 郑芳 142

风雨娄山关 王奇璋 144

彩练当空舞 辛茜 147

让我紧握你的手 熊珍 150

天边飘来梦中的云 康佳 152

外事处那些事 王雨晴 160

妈妈和贝贝的对话 印慧 162

花裙子情结 高玉凤 164

炭子冲问答录 梁洁 166

遥远的塔什库尔干 张爽 169

奔跑的水仙 李名渊 172

瞬间阳光 宁新路 174

· 报告文学 ·

债券 邱朝平 179

爱有多远 文猛 181

· 小说 ·

买油记 赵磊 191

一道特别考题 唐汉平 195

· 财政作家书架 ·

刘江华随笔作品集 198

张骏散文作品集 198

宁新路散文作品集 199

周燕散文作品集 199

封二：水竹遐想 项怀诚/文

渔乡三月 张月升/画

封三：心灵之约 王家新/文

草原 操驰/画

艺术辩证法的启示与灵感

李岚清



编者的话：在《音乐·艺术·人生》一书中，李岚清同志从经典音乐到通俗流行音乐，从全脑开发到培养创新能力，从艺术教育到提高全面素质，从工作到生活，从内政到外交，从音乐到人生，讲述的内容广博而生动，内涵丰富而深刻。他所谈的艺术，不仅是音乐艺术，还包括领导艺术、思维艺术、工作艺术和人生艺术。文中多处谈及他在主持教育、科技、文化、财经等工作时，音乐艺术带给他的思维启示与灵感，如何艺术化地解决了一些工作中遇到的难题。

《财政文学》特摘编《中国财经报》刊登的《音乐·艺术·人生》中的部分精彩内容分期刊登，这些透着朴实、艺术、智慧、灵动的文字，会对财政干部具有很强的影响和感召作用。

李岚清，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从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一直以“健身、健脑、读书、写作”自勉自励，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李岚清教育访谈录》、《李岚清音乐笔谈》、《音乐·艺术·人生》、《李岚清印痕》、《原来篆刻这么有趣》、《大众篆刻——李岚清篆刻书法艺术作品集》、《李岚清篆刻艺术俄罗斯巡展作品集》等多部著作，在国内外特别是在青年学子中产生了强烈反响。

230 余万民办教师“转正”始末

“民办教师”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在“文革”中，我国的教育事业遭到很大破坏，教师的培养工作实际上也停顿了。于是，广大的农村不得不招收没有合格学历的人来补充农村教师队伍，这样就出现了一大批“民办教师”。这些“民办教师”没有教师职称，没有工资，只有很少的一点生活补助，比正式教师的待遇要低得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采取措施，每年安排一些达到教师标准的“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但因财政困难，“僧多粥少”，能够安排转为“公办教师”的指标很有限，到1993年仍有230余万“民办教师”未能“转正”。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由于教师队伍不稳定，对农村义务教育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96年我去江西吉安市长塘乡陈家小学考察。当走过一间昏暗、破旧的小屋时，我们看到一位50岁左右的老师（名叫胡福邦）正在那里批改学生的作业。我走进去问他：“在这里工作多少年了？”他回答：“17年了。”我又问他：“每月的工资有多少？”他回答说：“没有工资，只有56元的生活补贴。”我吃惊地问他：“为什么这么少呢？”他说：“因为是‘民办教师’。”我顿时感到一阵心酸，强忍住泪水离开了那间小屋。再联想到我见过的那些农村学校的教师们，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民办教师”，他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尽心尽力地为农村教育不致中断而坚守教师岗位，那一幕幕感人的情景，让我不禁感慨万千。一路上我不停地思考：“文革”已经过去20年了，这个遗留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应当解决符合条件的“民办教师”的转正问题，不能再拖了。但是这么大的问题，只靠党中央、国务院下决心还不行，还需要各级党政领导共同下决心。这就首先要大家统一思想。

正好，那时天津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关于山村“民办教师”爱岗敬业、鞠躬尽瘁的故事片——《凤凰琴》，电影故事扣人心弦、催人泪下，艺术感染力很强。电影中的几个场面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如学校没有音响设备，每天升国旗时要由老师用笛子吹奏国歌。于是，我决定用这部电影作文章，通过电影使各级领导对“民办教师”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有较为形象的了解，从而认识到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首先建议中央电视台在电视上播放

这部影片，但电视台负责同志告诉我，一部新电影只能在公开放映两年后，才能在电视台播放。于是，我就和天津市的领导联系，因为我曾在天津工作过，他们都是我的老同事，我希望他们帮我做工作，请电影制片厂能够破例允许电视台播放。在他们的帮助下，电影制片厂同意予以支持。影片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放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了进一步增强这部电影的影响力，我又借中央召开会议之机，请与会的各地领导观看。我还担心他们工作忙，顾不上看，于是再要来电影的录像带，并给各省、区、市主要负责同志写信，希望他们抽空看一看，也放给其他有关同志看看。同时，我还把录像带推荐给国务院领导观看，因为决策层是在国务院。国务院各位领导看了电影都深受感动，李鹏总理甚至感动得流了泪。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开会讨论时作出决定，下决心解决“民办教师”的工资待遇问题。

《凤凰琴》的确是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为合格的“民办教师”转正，为他们能享受与公办教师同等待遇助了一臂之力。后来我又了解到，前面提到的那位胡福邦老师，已于1998年转为公办教师，现在每月工资998元，是高级教师了。

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再现。通过电影《凤凰琴》，我们最为深刻、形象地了解和认识到了“民办教师”对我国教育事业的挚爱与贡献，体会到了他们的生活与情感，感受到了我们从行政工作中很难感受到的东西，从而

加强了我们解决“民办教师”转正问题的紧迫感。同时,由于文学艺术既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具有比现实生活更为感动人的力量,因此文学艺术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感化人心、移风易俗的社会作用。电影《凤凰琴》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在解决“民办教师”转正问题上,恰好不仅增加了我们的感性认识,更重要的是发挥了感动人心的作用,在决策的关键时候,在理性可行的基础上,起到了动之以情的效果。

“借东风”解决教师住房问题

从1994年到2000年,全国共计投入教职工住房建设专项资金1144亿元,建造住房1.5亿平方米,高校教师住房条件显著改善。

“民办教师”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基础教育领域,而在城市,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教师待遇低,特别是住房严重短缺和条件差的问题,也是困扰教育发展与改革的一大问题。

在我分管教育之初,1994年,中央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接着1995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代表中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从此,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日益浓厚,教师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经济待遇也逐步得到了改善。但是,长期遗留下来的住房严重短缺和条件差这一“老大难”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严重影响教师队伍的稳定。

但要在短期内解决这个问题又谈何容易!尽管如此,这个问题始终盘旋在我的脑海之中,成为挥之不去的歉疚。

1993年我去广东中山市考察时,中山市的领导告诉我,他们的教师住房问题已经解决。我开始还有点不信,路过一个住宅区时,决定突然停车检查,结果发现,包括一些退休老教师在内的教师的住房条件都不错。

接着,我在大连考察工作时,大连市的领导告诉我,大连市委、市政府把市中心的“黄金地段”拿出来,建成4栋31层的教师大厦和4栋31层的科技人员大厦。大连市还下决心要在两至三年内全部解决教师住房困难问题,不仅城区要这样做,而且所属区县也要这样做。我去看了,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实例。

有些人会认为中山市和大连市之所以能妥善解决教师住房问题,是因为它们的经济条件好,其他地区可能就较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的想法是:东部经济条件好,但住房造价较高,中西部经济条件差,但土地和住房造价较便宜,解决这个问题固然需要经济条件,但更重要的还是各级领导要有尊师重教的思想,能拿出一套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当时正好中央狠刹兴建“楼堂馆所”风,我们能否借中央“科教兴国”的东风,把这股风引向为教师建造住房方面去呢?经与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建设部等有关部门研究,1994年10月,我们在大连召开了首次全国教职工住房建设经验交流会,总结推广了这方面的经验。接着又推动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了相应的优惠政策，部署在全国实施为教师建造住房的“广厦工程”。

所谓“广厦工程”，是借用唐代大诗人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意而命名的。诗人在这首诗中还祈求苍天：“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我记得当时我曾向各地领导同志讲：“杜甫的这两句诗，很多人都能背出来，也理解其中的含义。诗人这种善良的愿望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实现，但他道出了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心愿，故而流传至今。我认为，在今天社会主义的中国，诗人当年的心愿理应得到实现。小平同志曾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应当而且能够为广大教师建造千千万万间‘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广厦’，使他们能够‘俱欢颜’地安居乐业。我们应当少建一些楼堂馆所，多为教师建些住房。‘广厦工程’也是‘民心工程’。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既然是普通老百姓拥护的事，我们就应当努力去做，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这次会议要求各地、各级政府用五年左右的时间解决教师住房问题，并宣布每年都要在搞得好的地方召开一次现场经验交流会，检查推动这项工作的进展。这一部署得到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响应。为教师建造住房的“东风”刮遍祖国大地，各地、各级领导纷纷行动起来，结合当时全国“安居工程”和房改的各项政策，采取各种措施，

予以特殊安排，使“广厦工程”每年都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先后在大连、昆明、北京、南京召开了四次全国教职工住房建设经验交流会，介绍他们及其他一些地方的经验，参观他们为教师建设的住宅小区，检查推动教师住房建设工作。

“广厦工程”的实施很快见到了成效。从1994年到2000年，经过有关部门和各级领导5年多时间的共同努力，大量的教师公寓在各地拔地而起，基本上解决了教师住房困难这个大难题。据教育部统计，1993年全国城镇教师的人均住房面积只有6.9平方米，低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7.5平方米的水平；而2002年底城镇教师人均住房面积已达11.23平方米，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10.4平方米的水平。在这5年中，全国共计投入教职工住房建设专项资金1144亿元，为教师建造住房1.5亿平方米，高校教师住房难题得到有效解决。

“广厦工程”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工作在教育和科技战线的知识分子的关注。通过“广厦工程”，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把教师的住房等生活条件改善了，使他们能够更安心地工作，那么，中国的教育事业就会更加充满希望。

不把“筒子楼”带入21世纪

1998年和1999年，中央部委和地方共投资42亿多元，改造“筒子楼”教职工宿舍501万平方米，高校8万余户青年教师喜迁新居。

“广厦工程”显著地改善了广大教职工的住房条件，使得很大一部分教师安居乐业，但这并没有解决全部的教师住房问题。且不说地区和城乡之间并不平衡，即使在城镇，中小学教师的住房情况也要好于高校。尤其是我国进行住房制度改革后，高校的青年教师由于经济条件所限，住房条件仍然很差，不少人工作好多年了，仍住在条件很差的“筒子楼”里。

所谓“筒子楼”，是由办公室用作单身职工宿舍演变而来的，主要是指为高校青年教师临时安排的非正规住房，室内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的单间房。由于房屋陈旧简陋，狭小拥挤，“筒子楼”的走廊成了各家的厨房和杂物堆放地。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筒子楼”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或即将被淘汰的建筑形式，没有必要再保留了。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的是，由于中国是不发达国家，教育硬件投入仍然很不足。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青年教师留校以后，最初大都要住在“筒子楼”里。但正处在人生青春年华的教师，是具有创造性的（尤其在理工科方面），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无疑会使他们的科研和学术创造力受到影响。我想，如果大多数教师都已经有“广厦”可住，甚至很多人开始买了宽敞的房子，而我们的青年教师还在“筒子楼”里面受苦，甚至因为后顾之忧而拖了教学和科研后腿的话，我感到很是揪心。因此，我们必须立即着手解决这一难题。

1996年春节前夕，我和国家计委、国家教委、财政部的同志去北大、清华慰问

教师时，特意去看望了住“筒子楼”的青年教师，看到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差。除了在北京的高校，在外地高校我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

面对高校青年教师住房这样困难的情景，我们都极为不安，感到“筒子楼”问题不解决是不行了。于是，我们决定锲而不舍、一抓到底，在巩固和深化“广厦工程”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解决青年教师的“筒子楼”问题，进一步改善青年教师住房条件。在北大、清华，我们商定，由国家出资，请两校立即着手试点，尽快把“筒子楼”改造成单元房，并将其作为建设青年教师公寓的试点。正好当时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的院长也在场，他也曾在这种“筒子楼”中住过20多年。当时他未能马上理解改造“筒子楼”的用意，认为这种楼不值得改造了，应该另建新房。我一面向他说明选择改造而不是新建的理由，一面开玩笑地对他说：“你们如果连‘筒子楼’都不会改造，我建议考虑降低你们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的等级！”“激将法”起了作用，清华和北大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各把一栋“筒子楼”改造成了每户都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的一居室的单元房，而且通过改造、扩建使楼内住户由原来的45户增至51户。

之所以要改造“筒子楼”，主要是因为这样做可以较快地解决这个难题。若要新建，投资大不说，规划、征地、拆迁、建筑，需要很长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

“筒子楼”的基础大多是好的，改建、扩建花钱不多，以当时北京的物价水平计算，每平方米造价1000元左右。另外，过去

我在工厂工作时曾改造过“筒子楼”，并曾于1994年了解过中央音乐学院改造“筒子楼”的做法，知道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心中有些底。在试验成功的基础上，我们决心推广这项工程（后来被称为“筒子楼改造工程”）。

1997年，李鹏总理批准了我的申请，安排了1.5亿元总理预备费，让每个部属院校先改造一栋进行试点。1998年，朱镕基总理同意对高校“筒子楼”进行全面改造，两年内全部改造完成，绝不把大学的“筒子楼”带入21世纪。凡是青年教职工住的“筒子楼”，有一栋改造一栋，一律要改成单元房。投资由政府拿3/4，学校自己筹款1/4。各地党委和政府也纷纷响应，投资改造地方高等院校的“筒子楼”。就这样，从1998年开始，高校“筒子楼改造工程”全面展开。

据教育部统计，1998年和1999年，中央部委和地方共投资42亿多元，改造“筒子楼”教职工宿舍501万平方米，全面实现了不把“筒子楼”带入21世纪的目标，高校8万余户青年教师喜迁新居。经过改造的“筒子楼”住房，虽然居住面积不大，但都变成了有独立厨房、卫生间的单元房——青年教师公寓，装修、布置也各有特色，颇为雅致，成了一个温馨的家，使青年教师在有能力购买商品房的以前，有了一个过渡性的居所。

与此同时，我们还制定了一些政策，规定在科研、教育、文化等部门所属单位，凡是自有土地建设教师住房的，国家给予优惠政策，免除一切费用。于是各地又为青年

教职工和文化工作者建设了一大批公寓，使他们的住房条件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

我当了回“红娘”

为苏州丝绸工学院解决了“招生难”，并最终促成了苏州大学与其“喜结良缘”，是“艺术辩证法”给我的启发。

文学艺术修养有助于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开阔思路，能避免就事论事和“单打一”的思维方式与工作方法。在中外艺术中，都存在“有无相生”、“虚实相生”的互补性思维方式。这种“艺术辩证法”启发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统筹兼顾，要从多角度思考问题。

在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时期，我为苏州丝绸工学院解决了“招生难”问题，并最终促成了苏州大学与苏州丝绸工学院的合并，当了两校联姻的“红娘”。我认为，我在解决这一问题时的思维方式，可以作为我上述观点的一个说明。

1997年，有一次我到苏州市考察教育工作，先到苏州大学，看到经过调整合并后新的苏州大学运行情况很好，办学质量和效益都有了提高。但是校方向我提出，合并后的苏州大学已经有了文、理、商、医科类院系，却没有工学院；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他们希望再增设一个工学院。

接着我又去苏州丝绸工学院考察。那时，我去各地高校考察工作时，他们反映的主要问题大都是经费紧张，教学设施短缺、落后等。而苏州丝绸工学院的院长却

向我提了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当时由于丝绸行业不景气，报考该校的生源不足，学校面临的一大问题是“招生难”，希望我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开始我听到这个问题感觉很奇怪，当时总的来说考大学比较难，他们怎么会出现“招生难”的问题呢？而且，要求副总理帮助解决一个学校的“招生难”问题确实也有些不合逻辑。但在那一瞬间，我的各种相关知识一下子融会出一个解决方案。尽管这个问题本不应由我来管，我还是同他们进行了分析、探讨。我认为，该校“招生难”的问题主要是出在校名上。这个专业很窄的校名，会使考生产生毕业后就业难的顾虑。再加上那时丝绸工业不景气，“招生难”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对这位院长说：丝绸工学院与纺织工学院的教学内容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纺织原料包括棉、毛、麻、丝和化纤等，纺织设备和工艺往往也是大同小异，因此丝绸工学院也可以叫纺织工学院。而纺织机械的元器件往往又是机械学中最典型的基础元器件。例如，我在大学里学“机械原理”，讲到典型机械元件时，如直齿轮、斜齿轮、伞齿轮、曲轮轴、凸轮轴等，大都以纺织机械元件为例，可以说，纺织机械专业与一般工科也是大同小异。因此，若校名改为“苏州工学院”，也许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这位院长听后很受启发，非常同意我的观点，并立即向我提出更改校名的要求。我说：且慢，正好现在苏州大学想办个工学院，你们两家合起来不是更好吗？你们

若赞成，我可以给你们当个“红娘”。江苏省和两校的领导都赞成我的建议，两校最终“喜结良缘”。以后我曾多次了解苏州大学与苏州丝绸工学院合校的情况，得知是一个成功的决策，我这个“红娘”还算没有当错。

灵感迸发出“行走式节水灌溉”

改变大水漫灌这种既浪费水、又因开渠挖沟浪费大量土地的落后做法，是我国发展农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大家可能知道，我在大学是学工商管理的。那时的工商管理与现在的“MBA”不一样，是名副其实的又学工，又学商，又学管理，这是我的专业。我从事汽车工业工作近20年，后来长期做经济工作。由于有长期的工作阅历，我认为自己还有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但我爱好文艺、尤其是音乐，因此，在我的工作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时，灵感、形象思维往往会出来帮我的忙。音乐等艺术的不确定性与形象性，与我学习工商管理养成的逻辑思维的确定性和抽象性得到了互补。这种不确定性与确定性、形象性与抽象性的互补，对我的工作有很重要的意义。

我有一个习惯，即当脑子里产生灵感或浮现出鲜明生动的形象时，我一般不会放过，往往会及时地把它写下来，如果时间不允许也要简要地记一下。因为灵感往往朦胧而转瞬即逝，有些像音乐家在进行音乐创作过程中“动机”出现时的眼前一亮，

而有些灵感可能是有用的。事实上，音乐家在捕捉音乐灵感后，也往往会迅速地加以记录。有时音乐家来不及找到乐谱纸，甚至在衣袖或菜单上把它记下来。这些来自灵感的旋律经音乐家加工后写进或写成乐曲，或者成为美妙的小品，或者构成一首大气磅礴的交响诗，或者成为一部作品中最为震撼人心的乐章。由于灵感往往是对一个问题苦思冥想时突然出现的，所以尤为珍贵。可以说，灵感的产生虽然没有艺术创作中那么多，但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我自己就有这么一个例子。

1995年春，我国西北大旱。有一天晚上，我在家中看电视。我看到有关的报道中，许多田地龟裂，一些地方组织抗旱，使用的办法是：打井，用柴油机带动水泵大水“漫灌”。这时，我突然想到，长期以来我们对“灌溉”有个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认为“灌溉就是浇地”。我们应该改变这样一个传统的旧观念，树立“灌溉是浇农作物”的节水灌溉的新观念。以色列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开发了“滴灌”等一系列适合沙化干旱地区使用的节水灌溉设施。过去，我国也大量引进过这些设备，但由于以色列的经济高度发达，他们的农业实际上已经高度工业化和现代化，因此这些对他们有用的设施，对我们多数传统农业地区既不适用，又用不起。尽管如此，我们有的地方仍硬性照搬，用不起就把人家的设备改成“土”的。例如，用不起钢管，就用塑料管甚至竹管来代替，等等。

我始终认为，水资源不仅是关系可

持续发展的问题，更是关系可持续生存的问题。节约水资源，有效利用水资源，应该贯穿于我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农业生产方面，我们应当接受以色列的节水灌溉的理念，那就是农作物生产只需要一定量的水，多余的水不仅是浪费，而且对农作物和土壤也不利。至于用什么方法进行灌溉，应考虑到我国农业发展水平、作物种类、耕作制度、地形、土质等与以色列有很大区别，不应完全照搬以色列的具体设施。我国最迫切的问题，是要改变大水漫灌这种既浪费大量的水、又因开渠挖沟浪费大量土地的落后做法，尽量采用各种可移动灌溉设备，对农作物进行定点洒灌，实施具有我国特色的节水灌溉。

那么，具体该采用什么样的措施呢？我与汽车打了半辈子的交道，也在“五七干校”干过三年多农活，在这方面还有些知识和经验。我的脑海中就出现了一个念头，能否用行走机械搞出一种“行走式节水灌溉”？想到这种灌溉方式的好处，我便再也无法入睡。由于想得很多，形象思维就发挥作用了，尽管我没有学过绘画，但还是自己画出了示意图，并写下它的用法。事后，经过专家们的认可和完善，这种灌溉方式终于在实际生产中逐步得到了应用和推广，并且已经初见成效。这种灌溉方式最后就定名为“行走式节水灌溉”。2004年吉林大旱，干旱面积达2300万亩，其中严重干旱面积1500万亩。全省推广使用行走式节水灌溉设备2万多台套（此前已在使用的有10万台套）。

和人工漫灌相比，每亩节约种子 1 公斤，每亩节约水费 4 元。全省直接受益 1000 万亩，粮食增产 35 万吨，产生经济效益 2.8 亿元。

灵感的迸发是建立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统一的基础上的。当我们面对难以解决的问题，用逻辑思维、常规思维没法解决时，就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发挥形象思维和创新思维的作用。当然，良好的思维方式的形成，与一个人的文化艺术修养和人生阅历有关。人的脑子中吸收了各种经验、知识，这些经验和知识融合、碰撞产生新的创意和灵感，需要一种“触媒剂”，这种“触媒剂”往往是“艺术”。音乐、绘画、书法等能够培养和发展人的直觉和想象力，激发和强化人的创造冲动。

“主旋律”与“抓重点”

把握了主旋律就掌握了一首乐曲的灵魂。做工作，特别是在处理一些比较复杂的工作问题时也应如此，要善于抓重点。

在音乐作品中，所谓旋律，是按照一定的高低、长短和强弱关系组成的音的线条，是塑造音乐形象、表现音乐内容的最主要的手段。一首音乐作品，小到只有一两句歌词的民歌、民谣，大到有几个乐章的交响音乐，其中总会有一个不断重复出现、不断反复推进、不断加深人们印象、不断进入人们心灵深处的旋律，这就是主旋律。当然，一首乐曲中也总是会有其他

的旋律。一般说来，主旋律和其他旋律的关系，是主从关系、红花与绿叶的关系。一部音乐作品，无论其结构多么复杂，主旋律必须是鲜明的、清晰的，通过耳朵而直击心灵的，而其他的旋律，不论是变奏还是各种展开，都是为了使音乐在丰富多彩中凸显主旋律。反之，如果主旋律不突出，主旋律和其他旋律的关系不清晰，就会造成杂乱无章、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也就不会有很好的音乐效果。所以，清晰、明了、优美的主旋律，对一部音乐作品而言极为重要。把握了主旋律就掌握了一首乐曲的灵魂，一首乐曲的象征、标志。相反，没有把握住主旋律，没有把握住音乐主题，就不会形成明晰的音乐形象。

我们做工作，特别是在处理一些比较复杂的工作问题时也应如此。要善于抓重点，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不是主次不分、先后不明，重要与不重要一把抓。例如，在开展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时，人们为了表示打击的决心，提出搞什么“地毯式的排查”。我就不赞成这么做，经常告诫执法的同志，检查的重点应是那些管理不规范的集贸市场，这些市场中有不少不仅是假冒伪劣商品的集散地，而且还是逃税漏税的“特区”、藏污纳垢的庇护所、“超生游击队”的大本营，所以要集中力量排查、惩处和整治。我不是说那些现代化的连锁超市就没有假冒伪劣问题，但在那个时期不是整治的重点，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搞什么“地毯式”，有可能规范守法的经营者受到了干扰，而违法者倒可能漏网逃脱了。还有，人们都

说要从打击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的窝点这个源头抓起，我就提出：为假冒伪劣商品印制假商标和假包装的是更重要的源头。如果没有假商标和假包装，你生产的假货就骗不了任何人，一件也卖不出去。印制假包装、假商标，有时比印制假钞票的危害还大，必须狠狠打击。有人以为多头执法是加强执法，我却认为多头执法有悖责任制的管理原则，实际上是削弱有效执法。例如，有一次我们检查通过海关进入我国的“洋垃圾”时，原来声称应由他们管的那些部门，竟没有一家出来承担具体责任。

这些事表面上看与音乐没什么关系，实际上也有联系。正是由于长期的音乐熏陶和积累，培养和改善了人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从一个角度或沿着一个方向思考而解决不了问题时，就应该从多个角度、多个方向思考。采用发散思维的方式，往往有助于获得意想不到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我与希拉克的两次“超时”会晤

根据外交工作的需要，我分别于2001年和2002年代表中国政府正式访问法国，并两次会晤了法国国家元首希拉克总统。我访问的主要任务是与法国政府的有关领导成员达成协议，所以，会晤希拉克总统主要是礼节性的，安排的时间比较短。然而，在很快谈完正式话题后，当我们谈起有关中法文化的话题时，我们就“刹不住车”了，礼宾官几次推门进来提示已超时，希拉克

总统都置之不理。最后，还是我看看手表，有礼貌地主动告辞才作罢。

希拉克总统是一位有文化修养的人，对中国文化特别是西周的青铜器很感兴趣，对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等也有所研究。

2001年我访问法国时会见希拉克总统，送过他一本《赵氏孤儿》剧本。这本书是根据我的提议和构思，由国家图书馆制作的。书中汇编了三个版本的《赵氏孤儿》，即我国元代剧作家纪君祥创作的杂剧《赵氏孤儿》，法国著名作家、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伏尔泰根据法国传教士的译本再创作的《中国孤儿》，以及抗日战争时期我国作家张若谷先生翻译的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伏尔泰的《中国孤儿》自1755年在法国首演，至1833年止，总共上演了190场。1965年，为纪念中法建交一周年，法国政府还特意组织了这部作品的演出。250年来，一个“孤儿”一直穿梭于中法两国、两大文化之间，成为友好的使者和见证。希拉克总统见到这本书后，当然十分高兴。

会见时，我还向希拉克总统讲起一个关于他自己的小故事，让他大为吃惊。我说：“在一次欧盟首脑会议上，您既没有发言，也没有听别人的发言，却在看一本关于中国青铜器的书。”他听后很惊讶地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告诉他：“欧洲的报纸早就把这张照片登出来了！”

尽管会见已大大超时，可当我起身告辞时，希拉克却起身对我说：“请您等一等，我要请您看一件珍贵的东西。”接着他从书橱里拿出一个长方木盒，小心地打开，

科学艺术不分家

要想成为一名高素质的知识分子，就必须接受一定的艺术教育，具备一定的艺术修养；若要成为某一方面的大师级人物，就更应如此。

我国的传统文化里，“乐”具有很高的地位，常常与“礼”一起，并称“礼乐”。“礼”的功能是规范人的外在行为。“乐”的功能则是调节人的内在精神，使之平和中正，“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孔子说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就体现了这种礼乐观，同时强调了“乐”的教化功能。

“乐”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只有礼乐并重，才能使整个社会具有和谐的秩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化就是“礼乐文化”。

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今天，“乐”已经不再具有那样的地位和作用，但音乐教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所显示的独特功能和作用，却越来越重要。在这里，我主要强调音乐教育对于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作用。有很多事例表明，对于大学生来说，无论是学哪个专业的，要想成为一名高素质的知识分子，就必须接受一定的艺术教育，具备一定的艺术修养；若要成为某一方面的大师级的人物，就更应如此。

在这方面，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说明问题。例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李政道先生，都作过关于科学与文化艺术关系的演讲，很受欢迎。我在清华大学作讲座时，杨振宁先生得知后也来参加。

从木盒中取出一幅立轴，并慢慢展开。我发现原来是江泽民同志为他亲笔书写的一首李白的《静夜思》。希拉克兴奋地对我说：“这是一件非常珍贵的礼品。我一直珍藏在办公室书柜中，只有对文化修养高的人，才拿出来请他欣赏。”当然，有的话，如称我“文化修养高”，我不敢当。但由此可以看出，希拉克总统对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喜爱和重视的。正是诗歌和书法，使我们的心的拉近了距离。

我国有句俗语：“一回生，二回熟。”2001年的会见增进了我与希拉克总统之间的相互了解。2002年我与他再次会见时，我选编了一本《李白诗选》送给他。在诗选的扉页上，我特地用行书抄录了李白的一篇《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文章开头几句是：“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我认为，李白不仅诗写得很浪漫，人也很浪漫，这篇文章就是他的浪漫主义杰作。希拉克告诉我，他很喜欢李白，还告诉我一个“秘密”，说他正准备写一部叫《李白》的电影剧本。他表示，他了解中国人对李白的传统看法，但不太了解当代中国青年人对李白的态度，请我帮助他收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我回国后就请北京大学的专家帮助收集了这方面的论文，还专门译成法文汇集成册，送给希拉克参考。他收到后十分高兴。我们也期待着能早日看到这部法国电影剧本和电影，看看作为法国人的希拉克总统眼中的李白是个什么样子，我想，可能会比我们中国人眼中的李白更加浪漫吧。

我们交谈时，他说，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少年时，就有很强的识别“absolute pitch”的能力，并问我这个词中文怎么翻译？我告诉他应该翻译成“绝对音高”。这时我意识到，杨振宁先生有相当好的音乐修养，否则不大可能知道这样的音乐术语。李政道先生作过题为“物理与绘画”的讲座，国画大师黄胄听后很受启发，他生前曾对我说：“有茅塞顿开之感。”李政道先生还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科学和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本人也非常喜爱绘画，在写给我的信上还有他亲笔作的画。

我在《音乐笔谈》中介绍过，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前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同志具有很高的音乐修养，1920年他在巴黎创作了我国的第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我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同志也爱好音乐，曾登台演奏过小提琴。

我国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同志，不仅是科学大师，而且在音乐、绘画、摄影等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他早年求学时虽然学的是自然科学，但同时也学过钢琴和管乐，他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时，就是一位出色的圆号手，曾是学校铜管乐团的重要成员。钱学森曾师从著名国画大师高希舜先生学习绘画，而且成绩很好，得到高先生的表扬。他还出版过一本名为《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的著作，论述科学与艺术的关系。钱学森这样总结音乐对他的影响：“音乐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丰富了我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

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说到钱学森同志的艺术修养，以及艺术修养对钱学森本人科学发明创造的积极影响，我这里要特别向大家介绍钱学森的夫人——中央音乐学院的著名声乐教授蒋英。我认为，钱学森与蒋英的结合，真可谓是“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也许有的同志会说：一位科学家与一位艺术家结为伴侣，也许只是一种巧合。那么，我们来看看钱老自己是怎么说的。

1999年，中央音乐学院举办“艺术与科学——纪念蒋英教授执教40周年”纪念活动，钱学森同志给纪念活动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因为行动不便不能参加，作为蒋英的老伴，只能在此作个书面发言，表表心意。我和蒋英结婚已52年了，这真是不平静的52年，蒋英和我（所从事的）是完全不同领域的工作，蒋英在声乐表演及教学领域耕耘，而我则在火箭卫星的研制、发射方面工作。她在艺术，我在科技。但我在这里特别要向同志们说明，蒋英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和启示，在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在蒋英教授执教40周年之际，我钱学森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文艺与科技的相互作用。”

钱学森同志不仅自己具有十分深厚的艺术修养，而且一直非常重视各级各类教育中的艺术教育，特别强调文化艺术修养对于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作用，并且在不同场合反复宣传他的这种观点。1999年12月8

日，我陪同江泽民同志看望钱学森同志，他即向江泽民同志和我表达了他的看法。

类似的例子，除了我们国内的，国外的也有很多。例如，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他的小提琴演奏水平相当高；量子论的奠基者、德国科学家普朗克，钢琴也演奏得非常好，他们曾联袂演奏，此事至今仍被传为佳话。爱因斯坦从5岁起学习小提琴，一直到13岁。小提琴是他一生中最喜欢的乐器，据说他几乎没有一天不拉小提琴。他还自己学会了弹钢琴，特别喜欢即兴弹奏。音乐成了爱因斯坦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并对他的科学研究工作有很大帮助。

刚刚卸任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原来就是科班学音乐的。他高中毕业后考进享誉世界的纽约的朱利亚音乐学院，学习之余还参加爵士乐队，曾在一些餐馆和夜总会里演奏萨克斯管和单簧管。后来，因为乐队不景气，格林斯潘才到纽约大学攻读商业经济。但他终生喜爱音乐。我认为格林斯潘学过音乐的背景，对他后来成为金融家应该是有帮助的。

我还想再举一些例子。1994年我接见香港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全体委员，其中的一位是香港花旗银行的负责人梁锦松，他的发言引起了我的注意。梁锦松说他们招聘和选拔人才时，不仅选用学金融、经济、管理、法律等专业的人才，有时也选用学音乐出身的。我听了以后好奇地问：你们是不是有自己的音乐团体？他说那倒没有，而是因为他们发现，有些学音乐出身的人更富有创新思维，经过金融等有关知识的学习，有可能成为非常优秀的金融人才。所以，我

认为音乐的知识 and 修养，对培养人的创新思维能力是有帮助和促进作用的。

2000年我访问爱尔兰的软件研发中心——香浓开发区时，专门访问了以培养软件人才为主的利默里克理工大学。在该校为我们举行的欢迎会上，学校的艺术家们演奏了爱尔兰民间音乐。我问校长，你们是否设有音乐系？他说没有，但有一个爱尔兰民间音乐中心，该中心的工作任务一是研究和发展民族音乐，二是增加学校的音乐艺术氛围，帮助师生提高音乐修养。他们认为这对学理工的人很重要。这种做法，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对学生进行全面的素质教育。我希望我国高校的音乐社团，也能起到制造气氛、营造氛围的作用。我到学校来与大家交流的目的，也可以说是“煽风点火”，煽音乐之风，点音乐之火。

以上这些例子，让我想起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这个世界可以由音乐的音符组成，也可以由数学的公式组成。”音符加数学公式，就是真正完整的世界。你们看，鼎鼎大名的科学家尚且有这样的体验，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同样重视“音符”和“数字”的作用呢？

我的音乐爱好在“申奥”、“申博”中帮了忙

2001年7月，中央派我和刘淇同志带队去莫斯科为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在这期间，有一次我们在我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宴请俄罗斯政要和莫斯科市长卢日科

夫等。事先了解到卢日科夫市长是个音乐爱好者，我们的大使便在宴会上请来了俄罗斯的音乐家助兴。当乐队演奏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乐曲时，卢日科夫问：

“你在莫斯科学习过，会不会唱这首歌？”

我回答说：“会。”我是1956年在莫斯科学会的，可能是中国最早学会唱这首歌的人之一，到现在四段俄文歌词还记得很清楚。他风趣地说：“现在，即使在俄罗斯，能记住四段歌词的人也很少了，就连专业的歌唱家，一般也只唱二三段，我们俩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会唱四段歌词的人了。”他还建议：“让我们一起为大家唱一曲吧！”我们俩一起用俄文唱完这首歌以后，大家又唱了《莫斯科——北京》等歌曲，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在这种友好的氛围下，我向卢日科夫市长提出，希望他能支持我们的申办工作，为我们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他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也确实为我们“申奥”成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至今，我仍对这位市长为保证我们“申奥”活动顺利进行所做的努力心怀感激。

当卢日科夫市长知道我们“申奥”成功的消息后，立即给我们的驻俄大使打来电话，一是表示热烈祝贺，同时请大使向我提出，希望我能够支持莫斯科市申办2010年的世界博览会。当时，我已知道我国的上海市也要求申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只是中央尚未做出最后决定。于是，我只能请大使转达我对他的谢意，并策略地回应：如果届时中国没有城市申办，我一定支持莫斯科申办。2002年底，我们又一次相逢于摩纳哥的蒙特卡罗，我和吴仪等同志带队为上海市申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卢日科夫则来为莫斯科市申办。真

是狭路相逢啊！但那时恰逢俄罗斯不幸发生了人质事件，卢日科夫也感到莫斯科市申办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了，于是，他向我表示，预祝中国申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成功。

凑巧的是，在那次为上海申办世界博览会的蒙特卡罗会议上，我还与我的另一位老朋友——波兰副总理不期而遇。我与这位副总理之所以成为朋友，也与音乐爱好与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1996年我访问波兰时，他负责接待我。他和我一样，都是肖邦音乐的爱好者。我们之间的会晤、会谈，除了国务外，就是音乐，特别是肖邦及肖邦的音乐。有关肖邦的话题，也增进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在我访波时，他曾特地选择在肖邦演出过的一个古堡为我举行了欢迎晚宴，还请波兰钢琴家在肖邦用过的钢琴上为我们弹奏了肖邦的钢琴曲。但在蒙特卡罗——这个世博会的申办现场，我们成了竞争对手。我原本想采取“回避”的办法，以免尴尬。没想到，一到那里，这位波兰副总理就主动要求会见我这个老朋友。起初，我还为面对这位老朋友要谈些什么而犯愁，见面后却发现，除了叙旧外，其实他主要是向我传递一个信息：如果波兰提前出局，他这一票就投给中国。这位副总理还是波兰著名的经济学家，退出政坛后，有时还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和讲学，并被我国西南财经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现在，我们虽都已退出了国家领导岗位，但他到北京来了还是要求见我，这不仅是因为我们都曾做过副总理，都是学经济的，还因为我们都是音乐爱好者，特别是肖邦音乐的爱好者。

（作品总标题为《财政文学》编者加）